



人

文

中

国

书

系

227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从传统中 求变

——晚清思想
史研究



◎ 江
看

B222.24
712.2

论语新

● 贺绥世 / 著 武汉出版社

LUN YU XIN SHI

WUHAN CHUBANSHE



识

05-5



052 >

2405-5
2.8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传统中求变——晚清思想史研究/汪荣祖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1

(人文中国书系)

ISBN 7-80647-344-0

I. 从… II. 汪… III. ①政治思想史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

②戊戌变法——研究 IV. D09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0286号

书 名: 从传统中求变——晚清思想史研究

作 者: 汪荣祖
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310号)

发 行

网 址: WWW.BHZWY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昌市胜利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34万

版 次: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

定 价: 20.80元

ISBN 7-80647-344-0/I · 241

邮政编码: 330008

电话号码: 0791-6894626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我对晚清思想史研究此一课题的兴趣,始于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书之时,当时萧公权老师正在研究康有为思想,我受他的影响,即以康有为之前的变法思想家为博士论文写作的题材。我选择了十几个人物,包括冯桂芬、郭嵩焘、王韬、郑观应、薛福成、马建忠、何启、胡礼垣、陈炽、陈虬、汤震、严复、张之洞等作为研究的对象。

我根据这些研究,写了一系列中文论文,探讨晚清变法思想的性质与演变,以及有关戊戌变法的一些课题。这一系列文字,合为本书的上卷。

萧公权先生于1981年去世后,我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之约,编印《萧公权先生全集》,并将其英文专著译为《康有为思想研究》,得以逐字逐句地细读深思,获益良多,对康有为的整体思想有较深层的了解。萧作实为诸家论康之作中的上乘之作。我之所以写《康有为》一小册,全因亡友傅伟勋教授的督促,编入其“世界哲学家丛书”之中。我虽尽量不炒冷饭,详人之所略,略人之已详,但基本上未出萧先生的议论之外,我谨将此册收入本书的中卷。

1979年元旦,中美建交,中美之间学术渠道畅通,并建立了中美学术交流会的组织。我于1981年的夏天至1982年的春

◆从传统中求变

季,得到该组织的资助,以章太炎研究为题,在中国大陆作了八个月的研究与旅行。我带了一货柜的书回到维州山居,开始写有关章太炎的文字。我于1986年赴杭州参加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,已完成英文初稿。这本稿子于198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,书名是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*。

我久读康有为和章太炎的著作,渐感此两人之异,诸如经今古文、变法与革命皆非主要,而主要是两人的思想呈现迥然不同的趋向。康氏的文化观是单元的,见诸《大同书》;而章氏的文化观是多元的,见诸《齐物论释》。我写了《康章合论》畅论两氏的异同,今收入本书的下卷。

岁月匆匆,书窗生涯,不觉年过六旬,回首半世纪以来,读书的甘苦,点滴在心头,更感念几位良师益友的教导与启发。我对文史的兴趣开始得很早,少年时家居高雄,来了不少自大陆来台的安徽老乡,其中有一骨瘦如柴的年轻人,来台时只带了一张行军床和一幅祝枝山长卷。他的言谈与众不同,引起我的注意。原来他是前清翰林徐承尧的弟子、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后人,姓吴名博全。他教我读诗,作诗。我当年只有十岁,两人成了忘年交。他后来去了嘉义,又转往台北,历任报馆的编辑、主编、总编。他临别送了我一本赵松雪的书画帖,并在封面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曰:“兴安书道本堂皇,二百年前有二汪;荣祖谊承先世业,便当勤研十三行”,对我勉励有加。我在台大读书时还常去找他,最后一次见面是1979年的夏天,在他《联合报》大楼的办公室里,聚谈甚欢,然并未尽情畅言,总以为来日方长。不意他虽克服了癌症,却忽然中风而亡。他为我开启了中国文史之学的天地。因经史旧学已不可能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获致,惟有靠旧学有根底的人引导,而此种机缘却是十分偶然的。

我在初中时就对历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，所以考大学时并无选择科系的难题，困难的是社会风气已趋实用，男生多少都承受要报考“有出路学系”的压力，即使家父的美国朋友也问，若读历史系，“何以谋生(How to make living)”？我因兴趣浓厚，家境尚裕，不顾将来的稻粱谋，于1957年的秋天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。当年台大历史系号称名师云集，有不少来自北大、清华以及南京中央大学的知名历史学者，然并非都是第一流，许多顶尖史家如二陈，如顾颉刚，如雷海宗，如郑天挺等，皆未入台。然而名教授并不一定会培养学生。如果仅仅在教室中宣讲，效果并不很好。最苦恼的是，没有什么书可读，洋文书太贵买不起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版的文史佳著，大都成为禁书，不准看，而只剩下古籍。然而古籍不是线装就是线装的翻印本，全无标点，读之维艰。我虽在中学时就曾读过“四史”，但囫圇吞枣未求甚解。幸而得到一位救星，他是台大历史系最老的一位教授，姓徐，名光，字子明，江苏宜兴人。他家学渊源，四岁开始读“四书五经”，于旧学有极深的造诣。南洋公学毕业后又留学美、德，获海德堡大学西洋中古史博士学位，亦深通西学，1915年返国在北大教书。但他反对破坏中国传统，视陈独秀、胡适等新文化健将为仇雠，因转赴南京中大。抗战胜利后，又自中大转往台大，而台大仍是“胡适派”天下，因出版《胡祸丛谈》一书，而遭到排挤与孤立。徐先生挽澜无效，惟有教一些年轻人“识字”(读通古籍)为职志。但当时同学们视徐老先生为“顽固派”，避而远之不选他的课，我因而成为徐老先生的“知音”，也成为他以救世之心教导的受惠者。我今日能读古籍，写些尚称清通的文言，皆徐子明先生之赐也。

我于1962年秋天赴美留学，十年寒窗，受到好几位美国老师友善而热情的教导，特别感谢教我“外交史”的郝博(Pual S.

◆从传统中求变

Holbo)教授,教我“俄国史”的屈莱果(Donald W. Treadgold)教授,教我“日本史”的派尔(Ken Pyle)教授,以及引导我进入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高慕轲(Michael Gasster)教授。当然得益最多的还是万里寄踪在美国西雅图市的萧公权教授,我幸能登堂入室,在他的教诲下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。

自1971年以后,我一直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所州立大学执教,至今已满三十年,其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、台湾大学、台北政治大学作短期或长期的访问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,我与国内学者亦得相互切磋之乐,尤感欣喜的是结识了两位前辈学者——钱锺书先生与周一良先生。钱先生以小说《围城》闻名于世,然他的功夫见诸文史哲领域里的博学驰骋,他应是20世纪最博学而具才情的中国学者。承钱先生不弃,以我为小友(初见面时钱先生七十一岁,我四十一岁),每次到北京,都有侍谈的机会;平日去函,多蒙回复,前后给了我七十五封信。我写《史传通说》完全受到钱先生的影响,并蒙写序与题署书名,至今犹令我感念不已。

周一良教授是我在大学时代就已心仪的史家,他和唐长孺教授的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集》无法在台湾买到,我曾托人自香港偷带过来。我当时已爱读陈寅恪的著作,认为周、唐二先生乃义宁最好的传人,后来才知道唐先生是吕思勉的弟子。不过我于1981年夏天在武昌见到长孺先生,他自以“教外别传”自况,足见唐先生仍然是师法陈寅恪的。同年秋天访问北大,不意周一良教授亦在座,得以相见叙谈。此后,周先生多次访美,曾驾临敝校,并作精彩的演讲,亦得与其畅叙平生,真诚无隐,令人感佩,诚如周先生夫子自道“毕竟是书生”。多卷本《周一良文集》的问世,足称此一书生的丰碑,不因“文革”风波而逊色。

谈到影响我的师友,不能不说我的老友李敖。敖兄是我台

自序◆

大历史系的同学,比我高两班。他在台大时已是名学生,一袭长衫,在校园里飘逸而行,引人注目。他学富五车,辩才出众。我们在大学读的书,他在中学时已经读完。他下笔畅快,才气纵横,确是写白话文的高手。此一才子型的书生,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,竟成为威武不屈的斗士,愈挫愈勇,不时对时政以及社会各界作尖锐的批评。人们可以深恶痛绝他的放言无忌,然亦不能不佩服他的特立独行。他的黑牢没有白坐,他是台湾五十年来最出色的知识分子。我与他合写《蒋介石评传》,作为我对他侠义的支持,也是我们始终不渝友情的一个纪念。

今年炎夏,我重访阔别十年的北京,首都已面目一新,高楼林立,快速公路环绕,已具现代化大都会的气派,适又获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,举国欢腾,北京市必将更为美丽便适。访问北大时,承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热心敦促我的一些著作以简体字重新排印,以广流传。我感其盛意,遂将有关晚清思想的论文与论著略作整理,汇为一编,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聊供国内读者们参考。江西张国功先生于出版过程中仔细审订,付出辛勤的劳动,使我的旧作勉强以新面目问世,谨此对张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。

汪荣祖

2001 年 7 月 21 日

写于上海旅次

目录

自 序	(1)
-----	-----

卷上 晚清变法思想研究

一 晚清变法思想析论	(3)
二 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	(47)
三 郭嵩焘、严复、曾纪泽三人连环叙	(75)
四 王韬变法思想论纲	(90)
五 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	(122)
六 严复新论	(136)
七 严复的翻译	(144)
八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	(162)

卷中 康有为研究

一 康有为及其时代	(189)
二 思想雏型	(204)
三 一元思维	(220)
四 哲学诠释与政治改革	(227)

◆从传统中求变

五 思想之实践	(249)
六 保皇的意义	(284)
七 孔教及其挫折	(298)
八 大同乌托邦的建构	(307)
九 天游的旨趣	(325)
十 中国近代史上的康有为	(334)

卷下 康章合论

序说	(345)
一 评价康章的若干障碍	(349)
二 康章思想之异趣	(368)
三 康章与晚清思想的解放	(394)
四 康章与民国初年的新思潮	(422)
结论	(440)

附录 汪荣祖著述要目	(44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卷 上

晚清变法思想研究

一 晚清变法思想析论

一 引言

晚清有三大运动，即自强运动、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。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。从历史发展上观察，自强思想发生最早，继之以变法思想，再继之以革命思想。从思想发展上观察，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，但在新旧交替之时，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，如在咸同之际，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，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；又当光绪季世、甲午之后，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，已成风潮，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。但正当此时，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。及至清室最后十年，保皇与革命二党虽势如水火，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，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，学者已多论及。^① 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，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，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，殊不知思潮如江河，虽或有夺他流入海者，但一般言之，泾渭分明，不能以江

^① 参见冰峰《清末君宪与革命之论争》（台北：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，1966）；Michael Gasster, *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* (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69)。后书台北有虹桥翻印本。

◆从传统中求变

为河。是篇之作，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，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。诸思想因子之结合，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，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，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。

二 两个核心——变通思想与缓进思想

倡议变法，旨求变通，殆无可疑。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并非新出，国史上颇有成例。最有名者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，二者皆以求富强为求变的动力。不过，前者求富强以与列国争，而后者求富强以御敌国之威胁。晚清变法思想亦以富强为动机，然其目的不仅仅是与列国争，同时要应对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此未有之变局乃由于鸦片战后门户洞开，策应无方，明达之士忧心忡忡，不知所措，惟有惊叹。然从历史背景看，此巨变之起，实由于中国突然自帝国之世界进入列国之世界。按西洋列国的形成，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，经千余年逐渐蜕变而成，其势自然。但中华帝国经外力之压迫，猝然降为列国之一员，其势仓促，当之者其心情之惊慌失措，亦意料中事。有此一历史巨变，乃有反映此变的不同思想。倡导变法论者即欲以变求通，使中国成为一富强之近代国家，以摆脱内乱外患的危机。

然而“变法”一词虽旧，晚清变法的内容实新。变通思想虽自古有之，变通的实效自古难得。故晚清变法家目击历史巨变，处惶恐之世，编织其思想内容时，如何说服朝野人士应变，最称急务，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临之重大课题。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之际，或自觉或不自觉，每有抵制之倾向。何况中国文化遭外来文化之挑战，其反抗性更为强烈。加之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以保守为尚，弃旧换新，每多迟疑。凡此皆为采纳新思想内容之障碍，故变法家欲变当时之法之前，必先批判保守之积

习,剪除迟疑不前之心情。尤有进者,对当时思想界,尤不得不论证变通之合理与必要。

变通何以合理?何以必要?王韬曾谓国史即一变动之发展史,孔子亦圣之时者,若孔圣处今之世,亦必应变。^①是则,王韬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法,判定中国历史文化原本变化不息,今日求变乃极自然。

论证变通思想最可引用之传统经典,当属《周易》。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,人皆知之;何况易言玄秘,古来中国思想家多受其启发,然每有不同之结论。^②譬照铜镜,人人可以己影为形,晚清变法家自难免不以《周易》为据,求变求通。《周易》中之词汇,如“变通”、如“天道”、如“沿革”、如“道器”、如“自强”,乃时见于变法文献之中。例如王韬于《变法》一文中,开宗明义,即引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一语演绎其说。他对西力东渐与中国变局之间的关系,洞若观火,故谓利玛窦之东来已兆中国近代巨变之先机。^③先机虽早露,惟恒人不易觉察而已。他又用“天心”一词,颇似《周易》中之“天道”,王弼释易曰惟圣人能先知天道之变,^④而王韬则曰惟有少数有识见之士,才能洞悉天心的趋向。识见之士何在?王韬未曾明言,但似指晚清变法家,故其本人亦义不

① 参见王韬《弢园文录外编》(香港,1883),卷一,10页。

② 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研究《易经》之书有三百七十七种。近人严灵峰辑到三百五十二种,见《易经集成》(台北:成文出版社,1975)。另参见钱基博《经学通志》(台北:台湾中华书局,1962),12~13页;汤用彤《魏晋玄学论稿》(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57);李光第《周易折衷》(1716),此书论述周易对宋儒之影响。天主教士研究周易之书,至少可得两种:《周易原质谈》与《琐言分类》,皆藏梵蒂冈天主教图书馆,见徐宗哲《明清耶稣会士遗著提要》(上海:中华书局,1949),134页。

③ 以易为镜见王夫之《周易内传》,载《船山遗书》(1886),卷一,14~15页;《弢园文录外编》,卷一,12页。

④ 参见王弼《周易注》(1765),卷五。

◆从传统中求变

容辞,指出天心之所趋向。^①

又如严复之《天演论》。此书虽译自英人斯宾塞(Herbert Spencer)的《演进与伦理》(*Evolution and Ethics*),然经严氏典雅之笔意译后,中国学者读来不啻是一释易之新作。^②事实上,严复以“演进”为“易”而释之,所释之易,就内容实质而言,无疑是19世纪西欧思潮之缩影。他以“逻辑”(logic)为“名”,以“数学”(mathematics)为“数”,以“物质”(matter)为“质”,以“动力”(force)为“力”。是以《易》书上所谓名数为纬、质力为经,亦即西洋数理之四概念。而斯宾塞所谓由简易到复杂之演进,亦即是《易》书上所谓:“坤静而奚,坤动而辟。”^③于是,严复用西方学说,以易理演绎,说明变通思想乃中外通理,亦为人类社会文化进展不可避免者。

晚清变法家用传统思想模式、古典词汇来说明新说,事属自然,因彼辈原是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;而且亦有必要,因非如此新说便难以渗透旧思想界,如传教士撰写的俚俗之作便不能在当时的思想界推波助澜。用旧模式、旧词汇来解说新的变通

① 参见《张园文录外编》,卷一,10页;卷五,18页;卷二,18、19、25页。康有为已有近似之议论,见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(上海,1897),卷八。

② 参见钱基博《经学通志》,38页。

③ 严复《严幾道文钞》(台北:世界书局重印,1971),208页。不过,严氏这种中西思想比较,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的,杭辛斋认为民主与科学皆在其中,见钱基博《经学通志》,39~40页。吴森将易经与杜威哲学作比较,发现就形而上学而论,至少有两个共通之点,见 Joseph S. Wu, "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: Confucianism and Pragmatism", in *Philosophy, East and West*, 23:3 (July, 1973), pp. 323~332。牟复礼(F. W. Mote)教授更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化之“观念距离”,见 F. W. Mote, "The Cosmological Gulf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", in *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*, eds. by David Buxbaum and F. W. Mote (Hong Kong: The Cathay Press, 1972), pp. 3~17。晚清变法家固未注意此种“观念距离”,盖易学研究非彼辈注意重点。

之理,《周易》当然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。但是,晚清变法志士并不为《周易》所限。例如,他们并不以《周易》之定命论或天命观为然,而着重“尽人事”。换言之,人事而非天命乃是人类命运之主宰。^① 求变通亦即是在尽人事。

不过,晚清变法家并未尽弃天命观;他们以天命为人心以及历史趋向之反映。易辞言之,观察天命亦就是观察历史与人心,冀有所警惕。^② 按诸晚清之历史与人心,天命示变对变法人士而言,岂非太明显了吗? 若天命示变,而不尽人事,则听天由命,祸福无主。既尽人事,必须全力以赴以应变,此即康有为其变法奏议中,所强调的“刚断”,他要光绪皇帝学日本明治、俄国彼得,以帝王之大力来扭转乾坤。^③

然而,尽人事需有引导。晚清变法家以历史为最佳之指针。固然,中国自古以史为镜,但真能为今日人事导向之作,实在不多,此点郭嵩焘言之最明。他以为有用之史著,惟属史论,故传统之良史惟刘知幾与王夫之庶几近之。^④ 郭又由史通变,以为时间屡变,政制社会当随之变易以应时。^⑤ 郭氏曾有意撰元明史论续船山《宋论》,作为时变之参考,惜书未成。^⑥

变通不仅是历史文化进展之必然,且有实用的价值,盖变通可以纠谬。汤寿潜有言,凡制度皆由简而繁(此点似受严复译著

① 《易经》天命观之阐释可参看 R. G. H. Siu, *The Portable Dragon* (Cambridge: Mass, The MIT Press, 1968), p. 158.

② 王韬对普法战争之看法,最可见其天命人心之说,见《弢园文录外编》卷八,12~14页。并参考王韬《普法战纪》,卷一,86页。

③ 参见康有为《戊戌奏稿》(1900),1页。

④ 参见郭嵩焘《养知书屋诗文集》(台北:文海重印),217页。

⑤ 参见郭嵩焘《礼记质疑》(1873),卷一,2~3页;卷十,3页。并参看郭廷以等编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(台北:台湾“中研院”,1971)第1册,471~473页。

⑥ 参见郭嵩焘《养知书屋诗文集》,217页。